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09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①

曹顺庆,刘衍群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主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文论话语;“失语症”;融汇古今;“变异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059-06

一 “失语症”的提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与社会变化同步,中国文学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就是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首次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①中提出“文论失语症”的问题,接着,在另一篇有关“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的文章中笔者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

‘消化不良’。”^②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讨论。程勇在《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中谈到:“‘文论失语症’这一对当代文艺学困境的概括首先是由曹顺庆先生提出的……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③在1997年《文学评论》中,甚至连续四期开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的讨论”专栏,许多著名学者包括J·希利斯·米勒、乐黛云、蔡钟翔、张少康等都参加了讨论。在同年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失语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问题同样成为了讨论的热点^④。但不管学界各持怎样的论调,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失语”状态的确是中国文论话语建设道路中一直存在并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介于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的现状,笔者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构想。这一命题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响应和支持。季羨林先生在1996年撰文

① 收稿日期:2018-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6)

作者简介:曹顺庆(1954-),男,贵州贵阳人,教授,博导,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①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

②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③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

④曹顺庆,杨一铎:《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门外中外文论絮语》,对“失语症”及“中国文化话语重建”进行了探讨。“曹顺庆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很有见地的文章。我们意见不同之处只在‘失语症’这个词儿上,究竟是谁患了文论话语的‘失语症’?是中国,还是西方?”^①陈洪、沈立岩也在文章中指出:“检讨这一‘失语’的全过程,特别是目前的状况,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负面,即作为一个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我们做学生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其中的原因自非一端,而有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外敌入侵),有的则是‘自取其咎’。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失语’实为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多舛命运的必然结果。同样道理,文论的‘失语’又是这一广泛理论‘失语’(中性的、描述意义上的)的必然结果。……虽然对文论‘失语’的程度与性质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前提存在‘失语’现象还是无疑的。因此,重新建构文论话语系统,进而加入国际平等对话,是文论界同仁共同的课题。”^②

既然我们看到了中国文论的“失语”,就应该在理论的研究、实践中正视它,分析它并且积极地解决。因为话语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直接决定了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成功与否,也关系到中国文论能否真正走向世界。

首先,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主要是源自中华文化一种病态的发展和民族心态的失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文化被深深地动摇了。各有识之士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求新声于异邦”,抛弃传统文化,利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救民族于危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心态逐步失衡,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走向极端。所以,这种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外力逼迫下所产生的文化选择必然不是中国文化正常的发展样态。

其次,中国文论的“失语”代表着中国文论的灭亡吗?其实不然,中国文论并没有死,只是我们人为地认为它是死的。由于上述的民族心态失衡所导致的文化病态,历史地发展下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定势使我们惯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这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西方理论化的转化,完全曲解了中国古代文论,使得其走向

“失语”的道路。但运用中国传统话语的文艺理论并没有消失,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就充分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特别是《管锥编》,其“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多部文化元典进行了阐释。该书长达136万字,但并不是以西式的、宏观性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传的方式来书写,甚至用文言著书,每‘则’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句引文为起始,然后援引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观点”^③。显然,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仍然延续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既然中国学者看到了中国文论建设的“失语”问题,就应该“知耻而后勇”,敢于打破西方文论建立起来的理论定势,走向中国文论话语的自强之路。

二 学术规则的明确

中国文论话语建设除了看清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失语”问题,还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这种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学术规则始终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并不断派生出流动变化的思想和理论范畴。只有弄清楚这本质规律和规则,我们才能为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活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规则。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西方文论话语和中国文论话语的时候,要通过文化的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则来判定哪个是属于西方文论的范畴,哪些又是中国文论的范畴,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东西方各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和特色。

那么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规则及文化生成规律到底是什么呢?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老子哲学中,‘道’可说是实存或实在而非实体,就是说,‘道’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绝对单纯者或不变者,也不是构成万物的最后基质。‘道’又是以‘虚无’为其特征的,‘道’就是‘无’,惟其虚无,才能永恒而常在,即所谓‘常道’。但这所谓‘虚无’决不是不

^①季羨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②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③曹顺庆:《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存在,恰恰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者所以存在的最后根源,它只是无形象、无声音、无颜色而已。这正是‘道’的‘玄妙’之处。”^①所以老子阐释的“道”,根本上是“无”。他还明确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意义生成方式就是“无中生有”,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无在之在”“无物之物”。这种意义生成方式在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中叫作“虚实相生”,如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马远则用一位老翁独钓于船头,四周全是留白的画面来展示。但就是这“无”(留白)生出了烟波湖面的浩渺与秋意寒气逼人的意境。又如中国的传统琴乐——古琴,其弹奏的每个音之间自然存在着音响间隔的空间,每次被弹奏后就会以余音方式渐隐而去,这种在间隔空间中微妙而渐隐的无声转化正是“无”与“有”、“虚”与“实”的相生。虽然老子追求“无”,但如果完全不用语言来言说与表达,又如何告知于人,所以“老子创造出一条‘以言去言’之路,即通过有言,教人去认识、去领悟那无言之道,从而超越语言,直达‘道’之本真。”^②中国历史上的文论家大都承袭了这种学术规则,强调语言文字的表达不是最终目的,而语言背后深层的意义却更深远、玄妙,难以穷尽。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南朝梁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馀。”唐皎然《诗式·重意诗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司空图《诗品·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尧臣语)由此,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所特有的学术规则和话语生成及话语言说方式。而学术界十分推崇的“意境”理论,就是这一个意义生成方式的结晶。

另外一个中国文化的意义生成方式可以归结为“依经立意”,就是对经典的阐释传统。西方的阐释学,在当代文坛十分时髦,其实中国从来就有自己的阐释传统。如“诗无达诂”即是典型的一个例子。“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精华》。“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

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中所说:“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子刘将孙所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说的“古人赋《诗》,独断章见志。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③。“各随所得”“别有激发”,就是讲的文学阐释中的因人而异。此外,像王夫之在《斋诗话》卷一所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也是谈的阐释的差异性。以至常州词派论词所说的“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谭献《复堂词话》所说的“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及《复堂词录序》所说:“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依据这个传统,经历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到清代的朴学考据学。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囊括了《易》《诗》《书》《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13部儒家经典,内容博大,其中每一卷都由不同时代的大家进行注、疏,彰显出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经典阐释的重视和崇尚,以及由此形成的话语规则。

综上,“无中生有”的意境和“依经立意”的阐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潜在的、深层次的且不易改变的学术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会衍生出不同的中国文论范畴,如“妙悟”“兴趣”“比兴”“神韵”“意境”等,这些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文论话语体系。通过明确学术规则,运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就可以进行中西文化及文论的判定和选择。在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过程中,只要紧紧把握住中国文化的学术规则及意义生成方式这一根本原则,那么前述的“失语”问题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至于再出现中国文论全盘西化的极端情况。

三 变异学理论的建立:古今通变,融汇中西

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建设,不能再走前面的

^①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②曹顺庆:《道与逻辑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③《永乐大典(卷九〇七)》《诗》。

老路,用西方文论来阐发中国文论^①。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赞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所谓现代转换的前提是古代文论不行了,古代文论是死去的文论,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文论在现当代仍有生命力,可以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所谓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纯粹客观性理解是根本不存在的”^②,对待古代文论,它毕竟是古代的东西,除了看到其“通”的一面,更要发现它“变”的一面,“变”就是融汇中西,要在古今通变的基础上融汇中西。西方文论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把中西文论结合起来,其实就是一条很好的路。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融汇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变异学,受到西方学者的肯定。2014年,笔者的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由全球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德国海德堡同时出版发行。*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系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将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打造了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对变异学的研究和讨论。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苏源熙(HaunSaussy)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高度评价了笔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该专著的第50页,作者引用了笔者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中的部分内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于另一个必要的比较方向或者说过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2013年出版的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对比,

曹顺庆教授倡导第三阶段理论,即,新颖的、科学的中国学派模式,以及具有中国学派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第43页)。通过对“中西文化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顺庆教授的看法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第43页),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化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An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an impara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t least as procedure – is Cao Shunqing’s 2013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trast to the “French School” and “America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o advocates a “third – phrase theory”, namely, “a novel and scientific mode of the Chinese school,”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by relying on our own methods” (*Variation Theory* 43; emphasis added). From this etic beginning, his proposal moves forward emically by developing a “cross – civilizaional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43), which results in both the foreig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Signific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③)

正如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比利时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西奥·德汉(Theo D’haen)对《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所评价的:曹教授的该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an important stage),该书将比较文学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推向一种更为普遍(universal one)的理论”。“I am already sure, though, that Cao’s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y from a predominantly Western – centred approach to a more universal one.”)显然,比较文学变异学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标识性概念,

①林精华:《中国主体性何以丧失: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译介的另一后果》,《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②Shunqing Cao.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pringer, p.164.

③Cesar Dominguez, HaunSaussy, Dario Villanueva.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50.

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

笔者在2006年对于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①有很多西方著名学者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对全世界的比较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书中,笔者将异质性作为变异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从“求同”转变到“求异”,特别针对中国学派的现状而言,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同等话语地位的比较研究。在变异学理论的视域下,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异质性基本保证的中国古代文论,也变得神采奕奕起来。因为唯有“异”才能生“变”,这个“异”本位就是笔者提倡的以中国文化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就是要打破之前“求同”的研究路径,转向将异质性作为话语建设的出发点,跳出之前陷入的被西方文论话语同质化“失语”的怪圈。

在异质性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他国化”这一学术概念,也就是如何来“变”的问题,这一概念包括“拿进来”(中国化)和“走出去”(西方化)两个方面。这里先对“中国化”作以论述,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化”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一种借鉴。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化”曾一度威胁中国文化之根本。正如顾郭鏊先生所说:“佛教传进中国,有把中国文化的人间性、理智性和伦理性观念等加以推翻的危险……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化是根本虚弱,没有控制的佛教化;这是有文化解体的可能,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②但在唐宋政治家和学者强根固本的举措下,最终佛教还是被“中国化”,产生了一种新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中国化的宗教——禅宗。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就像今天的西方文化转变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情况一样,以史为鉴,我们不能被完全的“西方化”(被西方文化的学术规则所同化),我们应该把握住最核心、根本的一点:一

定要把中国的文化话语和学术规则摆在支配性的地位上,来实现中国“化”佛教,“化”西方文化及文论。用中国的学术规则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介绍和转化,消化和吸收其好的方面,就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做的尝试,他在精神上以意境说为内核,承袭了中国文化“求无”“义主文外”的学术规则,但他同时吸收了西方文论中的美学观念和新范畴,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理想的”“写实的”,创造出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境”“造境”等新概念。所以王国维的这种以中国文化学术规则与西方文论范畴的碰撞与交融,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由此他创造出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种新的话语,这种话语既不完全是西方的,也不完全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由“异”生“变”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条必然之路,是中西方不同文化在中国学术规则上的高度融合。同样,中国文论话语如果想走向世界,还需要将中国文化及文学理论推向“他国化”的道路,这个“他国化”指的不是针对在中国文化土壤和境域中的持续西方化,而是文化的传播与异质文明的接受问题,是中国文化及文论在其它不同文化境域上的“他国化”(西方化)。笔者在《比较文学教程》对于他国化有明确的定义:“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收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③之所以在前述大谈“他国化”的中国化,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失语状态,致使我们首先要解决全盘西化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长期存在的西方化现象不是他国化,而是属于一种文化的殖民。而“他国化”的中国化是扭转我们过往失语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笔者提出他国化首先作为一种文化复兴的解决路径,其次才是进一步的理论建设,只有先把中国文化及文化话语扭转转到正常的交流轨道中来,才能进一步开展理论层面的他国化研究。只有在“他国化”的实践和理论中,中外文化、文明的彼此双向互动和交流才能真正的展开与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才会

①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顾郭鏊:《佛教与中国文化》,张曼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71-72页。

③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走向更高的层面。

变异学已经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其世界性影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与指导意义,为提高跨文明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比较文学变异学其核心是关注跨文化研究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该理论话语体系既可以解决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又适用于对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的阐释,以及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与创造性。同时,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已成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代表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其不仅在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等领域广泛应用,而且作为方法论也在文化领域广泛使用,具有世界性与普适性的价值与意义。其是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

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已经开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此外,比较文学变异学话语体系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话语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以实现全球话语平等对话,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的复兴及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学者当代的重要使命。从中国文论的死亡到认识到它的生命力,再到在这个生命力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话语,是我们当今学者的目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责任,我们应该在这个道路上努力为中国文论的建设、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My View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O Shun-qing & LIU Yan-q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academic theory generally regarded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as the highest standard, thus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was in a state of “aphasia”. The Chinese academia has introspected on this. In the 1990s, a group of scholars with Cao Shunq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believed that to build up a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shall be clarified, and the law of Chinese culture generation and rule of academic operation shall be upheld. Standing at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s further clarified, that is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of literary theori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with those of the West. Embodied in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is concept has become the symbolic concept widely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marks the innovation and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aphasia”; integrate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with those of the West; “variation the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责任校对 游星雅)